

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表现及其教学对策

The *Putonghua* Performanc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Problem Area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aching

陈瑞端 祝新华 温红博 廖先

Chan Shui-duen Zhu Xinhua Wen Hongbo Liao Xian

【摘要】 本研究以2007-2008年度参加香港理工大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的2,861名学生为受试对象,分析他们在普通话基础知识、说话、聆听、朗读这四个范畴的表现。结果显示,学生在说话项目中表现最好,聆听次之,而朗读以及普通话基础知识则较差。其中,朗读错误集中在语音上,而普通话基础知识的明显不足则体现为对拼音和词汇的掌握欠佳。为了提升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至更为精准的程度,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重视普通话语音与用词教学,同时创设更多机会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下使用普通话进行口语交际。

【关键词】 普通话,说话,聆听,朗读,基础知识,教学对策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s of 2,861 students who took the *Putonghua* Proficiency Test (*Putonghua Shuiping Kaoshi*, PSK)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the academic year 2007-2008. Among the sub-skills of *Putonghua*, students performed best in speaking, followed by listening, and performed worst in reading aloud and *Putonghua* basic knowledge.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had difficulties in pronunciation when reading aloud and in mastering the basic knowledge

陈瑞端、祝新华、廖先,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温红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本研究得以顺利完成,有赖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测试组同事,以及课题组张丽娜女士、邬熾妮小姐的全力支持,本文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of *pinyin* and *Putonghua* vocabulary. To enhance the *Putonghua* proficienc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more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to the teaching of *Putonghua* pronunciation and vocabulary. At the same time, more opportunitie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Putonghua* communication in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Keywords: *Putonghua*,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loud, basic knowledge, countermeasure in teaching

香港社会长期以粤语作为惯用语的人口比例为89.5%，以普通话作为其他语言来使用的人口占46.5%（香港政府统计处，2012）。随着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香港政府更加重视“两文三语”的政策，鼓励人们在英语与粤语之外也更多地学习与运用普通话。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大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以证明其普通话程度（杨若薇，2012）。本文以香港理工大学所举行的普通话测试数据为样本，分析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表现，旨在为改善香港的普通话教学提供参考依据。

一 香港学生普通话水平研究概述

1.1 普通话整体表现

有关香港学生的普通话表现，过去曾有不少研究。部分学者利用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的普通话水平测试（*Putonghua Shuiping Ceshi*，下称PSC）资料分析香港不同考点考生（包括教师、大学生、市民）的普通话水平。PSC由国家语委开发，其中考生的普通话水平分为三级，每级再下分甲、乙两等，故其等级常被简称为“三级六等”。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2007）分析了1998–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PSC考试结果，发现87.6%考生达到三级或以上水平，但52%集中在三级水平。于星垣、谭成珠（2007）则根据2001–2003年岭南大学PSC结果，指出获三级甲等的考生占30.19%，三级乙等的占41.85%。这两个研究说明大多数香港考生的普通话处于三级水平，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这些结论是根据全体香港考生的资料而得出的，并非专指香港大学生。

现有的一些调查研究主要分析了香港大学生在普通话实际运用方面的表

现。1994年香港理工大学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7.1%的教师认为学生能说流利的普通话，4-6%的学生表示自己能运用普通话“讨论比较抽象的意念和题目”、“与教师交谈讨论”，或能“通过普通话学习和进修”、“听懂普通话授课”（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1996）。与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相比，香港大学生的整体普通话水平最低（汤志祥，2006）。在1997年后，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总体持续上升但幅度不算高（祝新华、陈瑞端、温红博，2012）。随着中国内地逐步开放市场，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多，内地访港旅客数量自1980年开始增幅巨大，而香港经济转型又带来较多服务业职位和更多高等教育机会，这些变化都大大促进了普通话在香港的使用，也对香港学生和在职人士的普通话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2003）。但是，香港雇主却普遍认为雇员的普通话能力不足（宋欣桥，2007；香港教育局，2013）。香港教育局（2013）公布的《毕业生工作表现以及雇主意见调查》表明，香港大学毕业生普通话表现依然偏弱，以5分为满分，平均表现仅为3.03分。这说明香港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普通话能力的培训。

以往的研究揭示了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部分面貌，但仍有必要准确评估大学生普通话表现的具体特点，针对薄弱环节采取适当措施，加强学生的能力。

1.2 学生普通话的具体表现

香港教育学院曾调查该校普通话选科生离校时的普通话水平，发现大部分学员的听辨能力优于听改能力¹；词语听辨能力优于篇章听辨能力；规范普通话词汇的能力表现较差；朗读能力优于说话能力；拼音译写能力表现较差（吴丽萍、何国祥、郭思豪，1999）。

在普通话语法习得方面，张翼（2014）发现香港教育学院150名普通话水平未达PSC二级的大学新生在“命题说话”项目中存在多种语法偏误，主要有句式杂糅、连词偏误、“有+VP”结构、副词偏误、助词偏误、指示代词“这”的遗漏、“在+方位短词”中方位词偏误、使用粤语中的“回复体”句式（如“我很感谢他，下次都要请回他吃饭”）等。上述这些偏误主要是源于粤、普差异或粤语的负迁移作用。不过，粤语与普通话的语法系统差异终究不算大（王力，1986），不至于构成很大的沟通障碍。

1 “听改”指学生聆听后改正不合普通话说法的语句。

词汇方面，香港的大学生比较难以掌握粤、普差异大的词汇，例如：同形不同义的词汇、同义不同序的词汇、北方口语词、部分熟语、部分高科技名称词汇等（罗瑛，2008）。词汇运用方面有近义词误用、单数复数混淆、方言词误用、量词误用等偏误现象（韩玉华，2007）。

普通话与粤语最大的差异体现在语音方面，因此语音成为粤方言区人士学习普通话时最难掌握的一环（何国祥，2001）。不论是声母、韵母或声调，都出现各种偏误（陈瑞端、祝新华，2012；何国祥，2005；李斐，2009；刘艺，2008；张励妍，2003）。李斐（2009）统计了参与口语会话课的4个班级48名大学生总计56小时的语音偏误，发现香港大学生最常见的声母发音偏误是n和l的混淆、舌尖前后音与舌面音的相互混淆；韵母方面的常见偏误为前后鼻音的混淆、复元音的脱落、介音的误加等。

声调方面，李斐（2009）发现香港大学生偏误最多的是第四声，尤其是将第一声和第四声相混淆。其中第四声读为第一声的错误最多，第一声读为第四声的偏误在全部声调偏误里排第三位，而轻声偏误则排第二位。刘艺（2008）分析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在朗读单双音节的表现时，发现学生会把阴平念成阳平或上声的非规则性偏误，如将“拥”误读成上声、“读”误读成去声、“料”误读成上声等。这些偏误的出现也主要是由粤方言的负迁移造成的。

在语气语调方面，罗瑛（2008）发现香港大学生如果在中小学阶段接受过比较长时间的学习，普通话的语音基础会比较好，但在语流音变、轻重格式等方面的掌握上还存在不足，特别是语感较差。林建平（2000，2001）根据香港考生参加普通话诊断服务及PSC考试的资料，指出考生说普通话时的语调问题主要是对词语的轻重处理不当，如轻声词重读、像粤语词语节律的一样字字皆重、语气助词重读等。

香港学生普通话较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论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粤语的影响。粤语在语法（李新魁，1994；王培光，1997）、词汇（曾子凡，2002；钟岭崇，1994）和语音（何国祥，2001；施仲谋，1986）方面，都与普通话有一定区别。不过，也有论者指出粤方言应试者成绩不如闽、吴、客方言的应试者（林建平，2007），而闽、普的差异可能比粤、普的差异还要大，可见粤、普差异并非是香港学生普通话水平偏低的单一原因。2002年香港青年协会调查了547名青少年（15-29岁）的普通话学习状况，81.7%的学生表示学好普通话有一定困难，最大原因是“很少机会用”（41.9%）；5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学校普通话课堂上才有机会讲普通话（卫士翘、莫汉辉、张静云，2002）。此外，香港大学生学习普通话的态度也不如学习英文那么积极（Humphreys & Spratt, 2008; Shek, Yu, Wu, &

Chai, 2015)。这可能与粤语、普通话、英语在香港的社会地位高低、交际功能的差异等因素有关。

概括而言,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分析大学生普通话的偏误, 分析结果有助于具体了解大学生的普通话面貌。但对于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整体水平、在各个分项的表现如何, 目前还欠缺专门的分析。此外, 就研究方法而言, 此前研究的学生样本量都偏小, 缺乏较大规模的测试作为基础。针对这些不足, 本研究采用普通话水平考试(PSK)作为工具, 以香港理工大学两千余名学生为样本, 分析当前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特点, 以期为今后的普通话研究和教学提供更具代表性的参考。

二 研究设计

本文所涵盖的研究范围是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学生普通话评估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也同时探讨了香港小学生、中学生的普通话水平(陈瑞端、祝新华, 2010; 陈瑞端、祝新华、刘文采、杨军, 2012)。因此, 本文所展示的结果可与其他部分研究成果相互对照, 以便全面了解香港学生的普通话特点。

2.1 普通话水平考试(PSK)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香港理工大学自行研制的普通话水平考试(简称PSK)。该套考试适用于考核香港地区粤方言人士的普通话水平。考虑到香港普通话教学的实际状况和需要, PSK分为A、B、C三级, 每级下面再分两等(A1、A2, B1、B2, C1、C2), 另外还有两个入门等级(C3、C4), 俗称“三级八等”。PSK入门以上的各个等级在研制的过程中, 都曾与国家语委所研制的PSC进行实测对比研究, 研究结果在2003年1月提交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 其“三级六等”被认定为与国家语委的PSC“三级六等”的等级水平等效, 其“入门等级”则在2006年1月通过由13位专家组成的审定委员会的学术审定。自此PSK的“三级六等”和两个“入门等级”构成一套完整的普通话测试体系, 是评估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重要工具。

PSK的评核内容包括聆听、普通话基础(判断)、朗读和说话四个方面, 具体结构见表1。

表1: PSK考试结构

	测试领域	题型	题号	题数	答题形式
试 卷 一	一、聆听试题 (40题)	1.选择题	1-20	20	3选1
		2.简答题	21-40	20	写2-5个汉字
	二、普通话基础 (判断)试题 (80题)	1.语法判断	41-50	10	3选1
		2.名量搭配	51-60	10	选配
		3.词语判断	61-70	10	4选1
		4.同音字判断	71-80	10	4选1
5.看汉字选拼音*	81-100	20	4选1		
6.看拼音选汉字*	101-120	20	4选1		
试 卷 二	三、朗读试题 (21题)	1.单音节字词	121-130	50字	计算机屏幕显示 内容,通过话筒 录音。
		2.双音节词语	131-140	25词	
		3.短文	141	1篇 (300音节)	
	四、说话试题 (3题)	1.回答问题 (先听后说、根据 情境说话)	142-143	2	从耳机聆听问题, 通过话筒录音。
2.自由表达		144	1		

注: *为参考试题, 得分不计入总分。

2.2 学生样本

香港理工大学自2001年开始每年举办PSK考试, 本次研究主要以2007-2008年度参与PSK考试的2,861名学生为对象。其中, 男生1,284名, 占总人数的44.9%; 女生1,577名, 占总人数的55.1%。94%的考生来自香港本地家庭, 绝大部分以粤语为母语; 其他学生来自中国内地及其他地区, 没有非华裔学生参加。整体考生的背景跟香港其他大学的学生背景相似。考生在参加PSK时均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的不同专业, 可从整体上反映该时段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及主要问题。

2.3 评分

书面试题卷中的选择题部分由电脑自动评分, 而书面试题卷中的简答题以及考生的朗读、说话表现, 则由资深评分员评分。香港理工大学语文测试组有一批长期固定的普通话评分员, 他们均有5年以上的普通话评分经验, 在评分前有试评卷、在评分过程有共同卷的安排, 可以控制评分标准宽严度, 确保评分准确。

三 结果与分析

3.1 整体表现

学生整体表现如表2所示，整卷平均得分54.84，标准差为13.66，这说明学生整体得分较低，但由于该批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的普通话学习时间长短不一，考生中也有一些内地生，因此学生之间的普通话水平有差异，但总体面貌有比较一致的倾向性。从得分率的角度看，总体得分率为55%，四个范畴中仅说话的得分率超过60%。这说明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跟早年的研究结果（林建平，2007；于星垣、谭成珠，2007）相比，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善。具体来看，四个范畴的得分率排序为：说话（62%）> 聆听（58%）> 朗读（49%）> 普通话基础（判断）（46%），未计入总分的汉语拼音得分率最低（45%）。由此可见，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听说能力相对较好，普通话的基础知识则相对较弱。

表2：普通话整体表现（n = 2861）

分卷	范畴	平均分	满分	得分率	标准差
卷一	聆听	5.81	10.00	58%	1.60
	普通话基础（判断）	4.57	10.00	46%	1.59
	小计	10.38	20.00	52%	2.84
卷二	朗读	19.77	40.00	49%	6.68
	说话	24.70	40.00	62%	5.07
	小计	44.46	80.00	56%	11.37
考试总分		54.84	100.00	55%	13.66
卷一汉语拼音*		4.46	10.00	45%	2.34

注：* “汉语拼音”（即“看汉字选拼音”、“看拼音选汉字”）单独算分，不计入卷一、卷二及考试总分中。

学生的说话得分率高于朗读，这与吴丽萍、何国祥、郭思豪（1999）的研究结果“学生朗读能力优于说话能力”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与近年香港各大学设置普通话的课程较重视交际功能有关。目前各校均开设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普通话课，强调走专业化路线以配合不同专业（施仲谋，2005）。罗瑛（2008）指出了香港各大学近年普通话课程教学的几个变化：从偏重语音、发音位置等知识性的讲解，变

为字音层面及词汇的对比学习；从偏重朗读课文，变为加强命题说话训练；练习从偏重语音书写、译解，变为不同语境的聆听和话语操练；教材开发从偏重结构性、知识性内容，变为强调功能性、交际性的内容。这些努力一定程度提升了大学生的普通话说话能力。

3.2 聆听表现

PSK的聆听范畴考查如下能力：（1）听取重点内容和重要细节；（2）快速搜寻和重点检索；（3）猜测词义、跳跃障碍；（4）推理判断和归纳总括；（5）信息转换和逆向思维；（6）理解隐性信息和感知国情文化。题型有两种：

1、选择题：主要考查聆听语速正常或稍快的普通话对话和一般题材话语的能力。考生聆听话语后，在三个选项中选出最恰当的答案。

2、简答题：主要考查聆听普通话词语、句子、语气、语调的能力。考生聆听后用二至五个汉字回答问题，答题时不限简体字或繁体字。

表3：聆听试题两种题型的得分（n = 2861）

题型	平均分	满分	得分率	标准差
选择题	3.30	5.00	66%	0.80
简答题	2.51	5.00	50%	0.97
聆听总分	5.81	10.00	58%	1.60

从聆听总分来看，本次测试聆听理解的平均分为5.81，标准差为1.60；最高分为9.60，最低分则为1.00，平均得分率为58%。可见大学生的聆听表现从分布状态来看是整体向好的。聆听选择题的得分率是66%，主要集中在3-4分数段，呈明显的负偏态分布。聆听简答题得分率是50%，主要集中在2-3分数段，基本呈正态分布（见图1和图2）。简答题的得分率比选择题低16%，导致聆听的整体得分率低于说话。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题型，做选择题时学生可以明确问题，有针对性地听，并且可能采用猜测的方法回答，但简答题则要求学生听得更清楚，更深入地理解播放的内容。

图1: 聆听选择题成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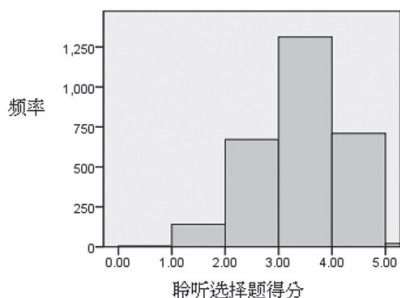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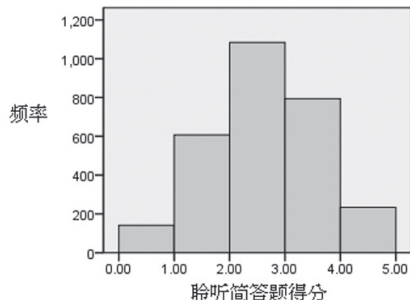


图2: 聆听简答题成绩分布图



另一项有关中学生普通话水平²现状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聆听总分的平均得分率为68% (祝新华, 2012a), 中学生的聆听表现要比大学生好, 原因参见下文“3.4朗读表现”部分的总结。

3.3 普通话基础 (判断) 表现

普通话基础 (判断) 范畴考查学生是否能掌握并判断普通话语法、词语、语音规范, 试题共有六种题型:

1、语法判断: 题目列出三个句子, 要求学生从中选出符合普通话语言规范句子。例如: 在“请给一本书我”、“请给我一本书” (答案)、“请给一本书给我” 中找出正确句子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2009, 页23)。

2、名量搭配: 题目列出5个名词和10个量词, 要求学生搭配。例如: 一 (节) 车厢 (页25)。

3、词语判断: 题目列出四个不同的词语, 要求学生判断哪个是普通话的规范词语。例如: 在“插掣、电插、插苏、插销 (答案)” 中找到规范的词语 (页26)。

4、同音字判断: 题目列出一个汉字, 要求学生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与题目汉字读音完全相同的字。例如: 从“比 (答案)、鼻、毕、逼” 中找出与“笔” 读音相同的字 (页27)。

5、看汉字选拼音: 题干是一个汉字或词语, 要求学生选出与汉字或词语完全符合的汉语拼音。例如: 从“zhāo (答案)、zāo、jiāo、jiū” 中选出“招” 的拼音 (页28)。

² 中学PSK的难度与大学PSK的难度等值。

6、看拼音选汉字：题干是一个汉语拼音，要求学生选出与拼音完全符合的汉字或词语。例如：从“噪、醋（答案）、措、糙”中找到与“cù”拼音相同的字（页29）。

其中第五种“看汉字选拼音”和第六种“看拼音选汉字”的题型都作为参考题，不计分，这是考虑到有些学者认为拼音是学习普通话的工具或手段，并非一种普通话能力。例如，陈瑞端（2003）质疑了香港常见的拼音考核方式的效度，认为不应在普通话测试时包含效度不高的拼音考核；施仲谋（2001）则认为，汉语拼音虽然不属于普通话能力的范畴，但在香港的普通话教学中有其特殊作用，因此在会考中安排10%的占分比例是恰当的。鉴于拼音的这种特殊性，PSK保留了“看汉字选拼音”和“看拼音选汉字”这两种题型，但只作为参考分数。

表4：普通话基础（判断）试题六种题型的得分（n = 2861）

题型		平均分	满分	得分率	标准差
普通话基础 (判断)	语法判断	1.40	2.50	56%	0.46
	名量搭配	1.26	2.50	50%	0.46
	词语判断	1.10	2.50	44%	0.52
	同音字判断	0.81	2.50	32%	0.65
	总分	4.57	10.00	46%	1.59
拼音参考 试题	看汉字选拼音	2.22	5.00	44%	1.21
	看拼音选汉字	2.24	5.00	45%	1.26
	总分	4.46	10.00	45%	2.34

从表4可见，大学生普通话基础（判断）总体水平较低，得分率仅占46%。在计分的四个题型中，按得分率排序为：语法判断（56%）>名量搭配（50%）>词语判断（44%）>同音字判断（32%）。可见在语言知识范畴，香港大学生对普通话的语法掌握较好，但在词汇和语音部分则表现较差。

不计入总分的拼音总分得分率是45%，和普通话基础（判断）总分的得分率相若（46%）。“看汉字选拼音”的表现（44%）不如“看拼音选汉字”（45%），但均比同音字判断（32%）要好。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同音字判断的要求较高，学生不仅要知道两个字的读音，而且要完全正确掌握两个字的声、韵、调，所以难度较大。普通话基础（判断）范畴中各题型的表现如图3-8所示：

图3：语法判断成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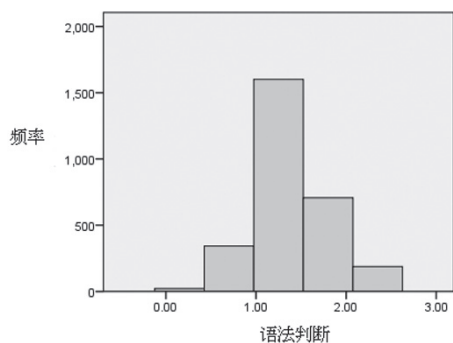


图4：名量搭配成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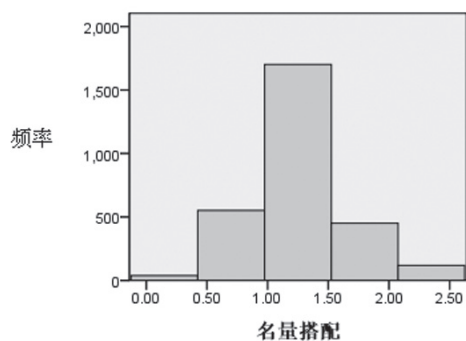


图5：词语判断成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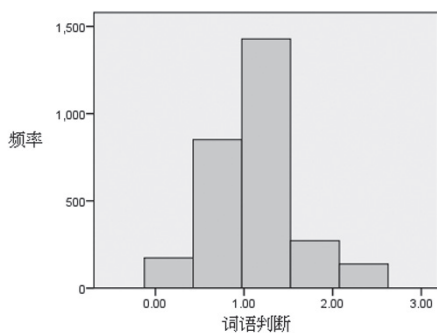


图6：同音字判断成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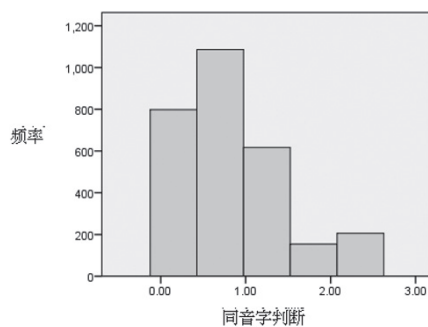


图7：看汉字选拼音成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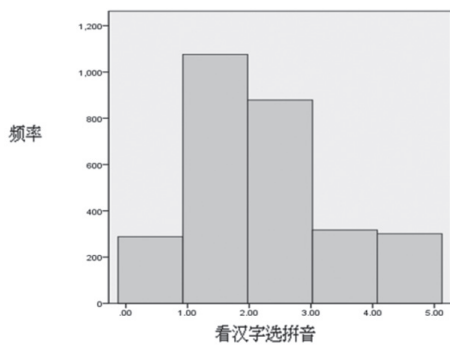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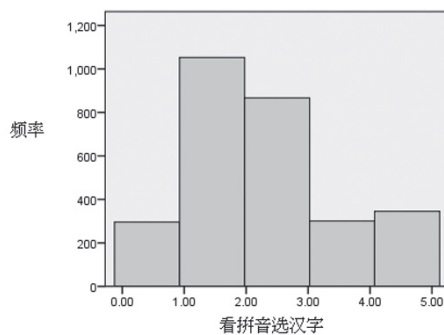


图8：看拼音选汉字成绩分布图



相比之下，香港中学生的普通话基础（判断）总体水平得分率为64%，四个计分题型的得分率排序为：语法判断（71%）>同音字判断（64%）>词语判断（62%）>名量搭配（59%）（祝新华，2012b）。可见，大学生在普通话基础（判断）上的表现，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各个题型表现，都比中学生表现差，尤其是拼音知识和词汇知识。

3.4 朗读表现

朗读范畴主要考查学生的字词发音是否准确，能否正确、自然、流畅地朗读句子和短文。其具体要求为：（1）对于字词，能读准单字的声、韵、调，以及词语的轻声、儿化、变调；（2）对于短文，在读准字词的基础上，能读准连读音变，恰当地停顿，掌控语调、语速等。

朗读试题有三种题型：

1、朗读单音节字词：针对粤方言的特点，考查学生普通话声母、韵母和声调发音的准确程度。50个字分为10组，每组5个字。

2、朗读双音节词语：针对粤方言的特点，除考查学生声、韵、调的发音外，还考查上声变调、轻声、儿化韵的读音。25个双音节词语分为10组，每组有2-3个词语。

3、朗读短文：要求朗读一篇300字的短文，除考查声、韵、调和连读音变之外，还考查语调、停顿、语气、语速等。

表5：朗读试题三种题型的得分（n = 2861）

题型	平均分	满分	得分率	标准差
单音节字词	3.48	10.00	35%	2.14
双音节词语	4.87	10.00	49%	2.04
短文	11.41	20.00	57%	2.89
朗读总分	19.76	40.00	49%	6.68

由表5可看出，大学生朗读总分的得分率为49%，三种题型的得分率排序如下：朗读短文（57%）>朗读双音节词语（49%）>朗读单音节字词（35%）。朗读单双音节的得分率在三种题型中排序偏低，从侧面说明香港大学生普通话的语音知识基础非常不稳固。

另外，朗读单音节得分率比双音节低，这种情况在PSC也同样出现。简启贤（2002）发现PSC的考试中，读单字的出错率一直高于读词语的错误率，单字题中的语素字的出错率比词字大约高2倍。应试者往往难以读准单字题中语素字的读音，原因可能是双音节词语的两个音节可相互提示读音，如知道其中一个音节的读音就可能猜出另外一个音节的读音；而单音节字词则缺乏其他提示，不知道读音就无法正确读出。简启贤（2002）认为有经验或能力较强的应试者通常会先在心里把这些语素字构成的词默读出来，以此确定这些语素字的读音。如果没有这个找读音的过程或者来不及完成这个过程，应试者难免出错。

在难度等值的中学PSK考试中，中学生的朗读总分得分率为72%，三种题型的得分率排序为：朗读双音节词语（78%）> 朗读单音节字词（72%）> 朗读短文（71%）（刘文采，2012）；其朗读总分和三种题型的得分率都比大学生高。三种题型相比，中学生的朗读单音节字词和双音节词语的表现较之朗读短文更好，其原因可能是这些中学生在普通话课程中已接受朗读单音节字词、双音节词语的针对性教学，而且这两种题型较之朗读短文的要求更为单一。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未接受过单音节字词、双音节词语的教学，要求他们字字读准十分不易，而朗读短文时除了字音字调外他们还可在语气语调等方面得分。概括而言，香港大学生无论是PSK考试总分、聆听、普通话基础（判断），还是朗读的得分率都未如中学生。其原因可能是，1998年普通话进入香港中小学的核心课程（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1996），2000年普通话成为中学会考科目之一，现时的中学生相比大学生而言，接受了更为完整的普通话教育。

3.5 说话表现

说话范畴主要考查学生是否能够用规范的普通话叙述、说明、议论，或进行交际。其具体要求为：（1）切合问题展开叙述；（2）语音正确，语调自然；（3）言语流畅；（4）语法正确，用词规范；（5）时间分配适当。说话试题结构分为两个部分，三种题型：

1、回答问题：包括“先听后说”和“根据情境说话”两种题型，考查学生是否能运用普通话进行熟练、规范的交际应对。

2、自由表达：考查学生熟练、规范地运用普通话的能力。

表6: 说话试题三种题型的得分 (n = 2861)

题型		平均分	满分	得分率	标准差
回答问题	先听后说	6.08	10.00	61%	1.40
	根据情境说话	6.12	10.00	61%	1.34
自由表达		12.50	20.00	63%	2.55
说话总分		24.70	40.00	62%	5.07

由表6可看出, 说话试题三种题型的得分率非常接近, 整体表现较好。其中, 自由表达表现最佳, 得分率为63%, 可能是由于自由说话让学生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学生可以就自己最熟悉的话题精心准备。相对而言, 回答问题对内容有较大的限制, 学生不但要结合题目所规定的范畴或所限定的情境说话, 还必须掌握相关范畴的词汇。尽管如此, 香港考生的普通话表达虽然能达到基本的沟通目的, 但往往给人很别扭的感觉, 听起来比较费力(韩玉华, 2007)。因此, 即使本研究发现学生说话表现相比其他方面为佳, 但他们的整体说话能力还需继续改善。

四 总结及建议

本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考试得分率仅为55%, 说明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2、PSK考试四个范畴的平均得分率排序为: 说话(62%) > 聆听(58%) > 朗读(49%) > 普通话基础(判断)(46%); 而未计入总分的汉语拼音平均得分率最低(45%)。这说明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听说能力较好, 但普通话的基础知识则相对较弱。

3、聆听范畴成绩较好, 学生能够听懂正常语速或语速稍快的一般题材的普通话。选择题得分率为66%, 但简答题得分率为50%, 表现较一般。

4、普通话基础(判断)范畴整体表现较差(得分率仅为46%), 六种题型得分率排序为: 语法判断(56%) > 名量搭配(50%) > 看拼音选汉字(45%) > 看汉字选拼音(44%) > 词语判断(44%) > 同音字判断(32%)。这说明香港大学生的拼

音和普通话词汇基础知识相对较差。

5、朗读总分的得分率为49%，三种题型的得分率排序为：朗读短文（57%）> 朗读双音节词语（49%）> 朗读单音节字词（35%）。

6、说话范畴，学生在自由表达的表现（得分率63%）比回答问题的表现（得分率61%）要好。

根据上述结果，本文对香港的普通话教学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普通话基础知识：本研究发现学生的说话表现较好，显示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隐性知识，但普通话基础知识较弱。香港大学生还有必要学习一些显性的普通话知识，从而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语言输出。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反馈时，可渗透一些语言知识的教学，让学生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帮助二语学习者同时建构隐性和显性语言知识，对提升他们的二语能力有莫大好处，这是不少二语习得研究所得到的共同结论（Ellis, 2000, 2005; Long, 1991; Schmidt, 1990; Skehan, 1996）。

2、坚持开展交际导向的课程：学生普通话聆听和说话方面表现相对不错，说明开设交际导向的课程对提升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很有帮助。教师可通过丰富而多样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和使用普通话的机会。目前各大学都录取了不少内地学生，校园语言已经包含了不少普通话的元素（陈瑞端，2012）。大学应尽量利用现成的语言资源和有利环境，为学生提供不同模式的普通话训练。

3、创设真实而丰富的语言环境：创设真实而丰富的语言环境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运用普通话的动机，为学生提供运用普通话的平台，有效提升学生的普通话能力。例如，通过各种内地考察或交流活动，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内地文化。侍建国、卓琼妍（2004）发现香港大学生在参加普通话沉浸课程后，在舌尖前后音和舌面音混淆、粤语入声字的普通话韵母发音不当、鼻音韵母和去声调偏误等常见的偏误上都得到明显改善。

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局限。首先，本文所依据的样本是2007-2008年度参与PSK考试的2,861名大学生，目前仍处于中学阶段的未来大学生，在等值PSK的测试中成绩表现更好，因此我们预见未来的大学生在普通话的各方面表现都会有所改善。不过，上文提及的一些普通话表现问题，同样在中学PSK测试中有所显示，因此我们相信对大学生普通话能力的分析，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依然有参考价值。其次，PSK是香港理工大学参考国家语委的PSC自行开展出来的一套普通话水平考试方法，尚未有较多的相关研究发表，因此在回顾有关文献时，我们需要参考不少基

于PSC得出的研究结论。然而，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在本文基础上针对PSK考试展开调查，为香港普通话教学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与指引。

【责任编辑：曾佩瑜】

参考文献

- 陈瑞端（2003）关于香港地区普通话教学的一些反思，载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香港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论文集》，页133-144，香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香港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
- 陈瑞端（2012）香港教育领域的两文三语应用状况，载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2》，页369-381，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瑞端、祝新华（2010）《小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
- 陈瑞端、祝新华（2012）中学生普通话语音的间接表现，载陈瑞端主编《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页133-168，香港：中华书局。
- 陈瑞端、祝新华、刘文采、杨军（2012）《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香港：中华书局。
- 韩玉华（2007）香港考生在PSC“说话”中常见的语法偏误分析，载宋欣桥主编《香港普通话测试研究与发展》，页238-259，香港：商务印书馆。
- 何国祥（2001）广州话普通话语音对应规律对香港普通话教学的意义，载何国祥主编《香港世纪之交的普通话教育》，页231-245，香港：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
- 何国祥（2005）香港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错误类型及纠正方法，载何国祥、张本楠、郭思豪、郑崇楷、张国松、刘慧合著《香港普通话科教学理论与实践》，页139-162，香港：三联书店。
- 简启贤（2002）PSC单字试题中语素字对测试目标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4，42-47。
- 李斐（2009）香港大学生普通话口语会话语音偏误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S3，80-86。
- 李新魁（1994）《广东的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林建平（2000）普通话诊断服务中的语调问题，载周汉光主编《语文教育新动向：一九九九年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页275-28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 林建平（2001）香港人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表现的方言语调，载李学铭主编《语文测试的理论与实践》，页506-516，香港：商务印书馆。

- 林建平（2007）香港普通话教育的现状与展望，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第三届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70-275，北京：语文出版社。
- 刘文采（2012）中学生普通话朗读的表现，载陈瑞端主编《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页169-200，香港：中华书局。
- 刘艺（2008）粤方言区普通话字音的偏误类型及字音习得的量化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67-71。
- 罗瑛（2008）香港地区大学普通话教学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1，19-23。
- 侍建国、卓琼妍（2004）香港学生普通话沉浸前后语音调查，《中国语文通讯》，70，16-30。
- 施仲谋（1986）《广州话普通话语音对照手册》，香港：华风书局有限公司。
- 施仲谋（2001）普通话测试内容初探，载李学铭主编《语文测试的理论和实践》，页496-505，香港：商务印书馆。
- 施仲谋（2005）《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欣桥（2007）从广告招聘用语看香港雇主对雇员普通话水平（等级）的希求，载宋欣桥主编《香港普通话测试研究与发展》，页30-39，香港：商务印书馆。
- 汤志祥（2006）香港普通话教学的新视角（上），《普通话教研通讯》，18，12-13。
- 王力（1986）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普通话丛刊》，2，6-7。
- 王培光（1997）普通话与粤语的语法差异与其教学，《文史通讯》，3，82-92。
- 卫士翘、莫汉辉、张静云（2002）《青少年意见调查系列（九十七）：青少年学习英语及普通话的状况》，香港：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
- 吴丽萍、何国祥、郭思豪（1999）香港教育学院普通话选科生离校水平试验测试分析报告，载何国祥主编《语文与评估》，页625-641，香港：香港教育学院语文教育中心。
- 香港教育局（2013）《关于2010年度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工作表现雇主意见调查：报告摘要》，取自：<http://www.cspe.edu.hk/GetFile.aspx?databaseimageid=970-0>
- 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1996）《教育统筹委员会第六号报告书》，取自：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major-reports/ecr6_c_2.pdf
-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2009）《普通话水平考试考试大纲及试题样本》，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2）《2011人口普查：简要报告》，取自：<http://www.census2011.gov.hk/pdf/summary-results.pdf>
- 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2007）普通话水平测试统计（1998年11月至2006年11月），载宋欣桥编《香港普通话测试研究与发展》，页48，香港：商务印书馆。

- 杨若薇 (2012) 普通话水平测试在香港的应试群体变化及发展趋势——以香港公开大学为个案的考察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S1, 2-8。
- 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 (2003) 《提升香港语文水平行动方案》, 取自: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chi/doc/Download_ActionPlan-Final_Report\(C\).pdf](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chi/doc/Download_ActionPlan-Final_Report(C).pdf)
- 于星垣、谭成珠 (2007) 普通话水平测试推动博雅教育——香港岭南大学中国语文教学与测试中心主任田小琳教授访谈辑录, 载于星垣、谭成珠编《国家考试港人瞩目: 普通话水平测试 (PSC) 在香港进行十周年回顾》, 页47-49, 香港: 鹭达文化出版公司。
- 曾子凡 (2002) 《广州话·普通话语词对比研究 (修订本)》, 香港: 香港普通话研习社。
- 张励妍 (2003) 《从广州话声调看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错误类型》, 取自: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zhangliyan/zly02.htm>
- 张翼 (2014) 现阶段香港大学生普通话“命题说话”测试项中的偏误分析, 《台湾华语教学研究》, 8, 59-80。
- 钟岭崇 (1994) 香港方言词汇与词汇教学, 载香港中文教育学会编《语文教学面面观》, 页224-230, 香港: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 祝新华 (2012a) 香港中学生普通话聆听表现, 载陈瑞端主编《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 页59-108, 香港: 中华书局。
- 祝新华 (2012b) 中学生普通话语法规范的偏误表现, 载陈瑞端主编《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 页109-132, 香港: 中华书局。
- 祝新华、陈瑞端、温红博 (2012) 十年间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发展变化——基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十年考试数据, 《语言文字应用》, S1, 58-66。
- Ellis, R. (2000). Task-based research and language pedagogy.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4(3), 193-220.
- Ellis, R. (2005). Principles of instructed 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33(2), 209-224.
- Humphreys, G., & Spratt, M. (2008). Many languages, many motivations: A study of Hong Kong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different target languages. *System*, 36(2), 313-335.
- Long, M. H. (1991). Focus on form: A design fea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K. de Bot, R. B. Ginsberg, & C. Kramsch (Ed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9-52).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chmidt, R. (1990).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1(2), 129-158.
- Shek, D. T. L., Yu, L., Wu, F. K. Y., & Chai, W. Y. (2015). General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a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Evaluation findings based on student focus groups.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40(8), 1017-1031.
- Skehan, P. (1996). A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sk-based instruc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7(1), 38-62.